

回回药方叙论

回回药方·叙论

学苑出版社

出版说明

论《回回药方》与回回医学的整理研究（代序）

王雪苔

西域科学文化东传与《回回药方》初探

艾·努·安迪光

《出版说明》

回回医学是中国传统民族医学中优秀的一支，是阿拉伯医学与中国医学高度融合的产物，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见证。但长期以来，对其历史发展及医学理论体系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的研究与认识。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我社决定影印这部《回回药方》，以飨广大医史研究者及医学工作者。

《回回药方》全帙三十六卷，仅存四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成书大约在元代，或以为它是在长时期的医疗实践中，诸多精通回回医学的医生的经验汇编，是众人智慧的结晶，但具体的汇编、总结者已不可知。以残卷目录推测，全书共录入验方约六千余首左右，涉及内、外、妇、儿、神志、皮肤、骨伤各科，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大型回回医药宝典。其书以汉文为主，兼以波斯文、阿拉伯文等语言文字作注解，不仅对研究阿拉伯医学的东传，中、阿医学的交流情况，而且对继承、发扬这份珍贵的医学历史遗产，古为今用，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对探讨古波斯文、阿拉伯文等文字在中国的传布和演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为方便广大研究人员阅读此书，我们特约原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王雪苔教授作序；并由中国中医研究院民族医学研究员兼教授安迪光先生作综合论述。

艾·努·安迪光（一九二九）

，回族。全名安迪光·艾哈麦德·努尔罕格·安都鲁，为东南亚古苏禄东王「都葛·叭

哈喇」第十七代嫡孙。自幼受伊斯兰文化熏陶，有志于回回医学的探索。曾长期在大西北巡回医疗，对回回医学有深入的研究，曾先后发表《中国回回医学史稿》、《祖国医学思想史大纲》、《回回医学临证举要》、《经络物理研究导论》、《试解吉益东洞之疑》等有影响的论著，是中国现代回回医学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九十年代以来，为国家级「回回医学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的学科带头人兼项目负责人，其回回医学是「东西合璧」产物的理论在中国及世界医学界有相当的影响。

《回回药方》是珍如琪璧的善本珍藏，且后世从未梓行，民国间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据北图本誉缮一部。现本社特据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出版，以便使这部古代医学宝典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回回药方》与回回医学的整理研究（代序）

王雪苔

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传统文化里，传统医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既包括来源于汉族的中医，也包括少数民族医学。中医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的代表，自公元六世纪即已传至亚洲一些国家，当今正在走向世界，形成东医西渐、将与西方医学并驾齐驱之势。少数民族医学，如藏医学、蒙医学、维医学、朝医学、彝医学、傣医学、壮医学、回回医学等，也都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在理论与实践上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纵观我国少数民族医学，可见它们都带有双重印记：一是带有本民族的印记，包括本民族的生产与生活习惯、民族聚集地域的气候与地理特点、文化背景与社会意识形态等；二是本民族以外的医学影响的印记，其中最明显又最普遍的是受到中医的影响，也有受到印度医学或阿拉伯医学的影响。因此，认真发掘、整理、开发少数民族医学，不但是广大人民群众防病治病的需要，也是促进少数民族医学与中医学结合，为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传统医学创造必要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医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少数民族医疗经验得到了发掘整理，少数民族医生得到了扶持、古传的少数民族医著得到了整理出版，并且还出版了大量新著。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等自治区，还成立了民族医学研究所，广泛设立了民族医院，有的还创办了民族医学院，把培养少数民族民族医生纳入高等教育系列。卫生部主持编写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九十二个分卷中，专门设有《蒙医学》、《藏医学》、《维医学》、《朝医学》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收入了蒙、藏、维、朝等少数民族医学条目。上列情况表明，我国政府和医学界对于发掘、整理、研究、开发少数民族医学是十分重视的，工作卓有成效。

在我国的诸多少数民族医学中，只有回回医学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历史上遗留给我们的文献资料太少，加之在回族当中又缺少以回回医学为业的世代相传的医生，所以我们今天对回回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情况所知有限，许多问题扑朔迷离。

元代是回回医学的兴旺时期。据《元史》、《新元史》等书记载，至元初回回爱薛创立京师医药院，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改为广惠司，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至元二十九年（公元一二九二年）又在大都、上都各置回回药物院，掌回回药事。至治二年（公元一二三二年），回回药物院拨隶广惠司。广惠司的最高官职为司卿，正三品，与太医院相比，仅低于太医院使一个品级。回回药物院的最高官职我为达鲁花赤，从五品，与御药院、御药局的官职品级相同。由此可见，回回医学在元朝医事制度中的地位是仅次于中医的。元朝统治者之所以如此重视回回医学，乃是由于元朝政府重视开发西域，重用色目人，需要回回医学为其皇族、权贵及来自西域的军士、工匠等人服务。明、清时期，由于政权更迭，新

的统治者对回回医药的需要减少，所以也就不再设置专门的回回医药机构。

元代曾对回回医学进行过总结，《回回药方》即其代表著作。此书原有三十六卷，曾有明红格抄本传世，可惜今只残存目录一卷，正文三卷而已。关于此书的撰写年代，多数人认为撰于元代，然亦有人认为撰于明初，有人甚至认为撰于明末，我同意撰于元代之说。我曾看到过一部清代抄本《永乐大典》目录，其中涉及回回医药者三十八卷有奇。卷一千四百二十六至一千四百五十一，为《回回医书·内科》；卷一千四百五十二至卷一千四百五十七，为《回回医书·外科》；卷一千四百五十八至卷一千四百六十三，以及卷一千四百六十四的前一部分，为《回回医书·药方》。以《永乐大典》所收的《回回医书》与《回回药方》对照，可见两者的卷数和内容分配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所以我怀疑《回回医书》与《回回药方》是同一医书的不同传本。按《永乐大典》编纂完成于明代永乐六年（公元一四〇八年），所录诸书均为宋、元版本，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名为《回回医书》或《回回药方》这部专著成书年代不会晚于元代。《永乐大典》在传世过程中，屡遭盗窃和劫掠，损失殆尽。其中的《回回医书》，于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已经散失后半部分，迨至清末则已全部荡然无存。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元代回回医学专著，除了明红格抄本《回回药方》残本四卷以外，再无其他传本。这也正是《回回药方》残本弥足珍贵之处。

《回回药方》是用汉文撰写的，其中有不少阿拉伯医学病名和药名的音译，还夹杂着阿拉伯文字。尽管如此，此书却不是阿拉伯医书的译本，也不是阿拉伯医学用汉文重编。从内容来看，此书既包含阿拉伯医学成分，也包含中医成分，可能还有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医学成分，实际上是东西方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关于这个问题，有些研究者已经从诊法和药物角度进行了论证，我在此再从针灸学角度加以探讨。《回回药方》卷三十四含针灸门，列有十六种证候的灸治方法。其中提到的经脉名称，有「肝经」、「胃经」、「脾经」、「肾经」等。有人认为这些名称只是代表脏器，与经脉无关，不过是《回回药方》借用中医词汇而已。可是仔细分析书中的有关论述，可见这些名称并非与经脉无关。例如，书中记载：「第十六等，是肾经证候，到两股里向」；有「灸肝经，……是将灸的器于肝经下右股里向稍上处一灸」。像这样把「肾经」、「肝经」与「股里」联系起来，显然是由于肾、肝二经通过股里之故。我们再来研究一下穴位。书中列举了一些病证的灸治穴位，都有固定位置，而且与中医针灸穴位非常相似。例如，「若恐生癰证者，头上灸五处：一在脑之生发起处，二在囟门以上少许，三在头后风府穴稍上，后二处在两耳后脑骨接处。」按癰病即麻风，古称疔风或大风，古籍多将此病归于风门。检《千金翼方》卷二十六载诸风的杂灸法：「凡风，灸上星二百壮，又前顶二百壮，百会一百壮，脑户三百壮，风府二百壮。」又云：「治风，耳后八分半有穴，灸一切风。」以《回回药方》的五处灸穴与《千金翼方》标出的上星、前顶、脑户、耳后穴位相对照，二者如出一辙。此外，针灸门所载咱土里占必及蛊证的灸法，所用穴位也与中医学的施灸穴位基本符合，不再细述。至于施灸方法，《回回药方》所用灸法实为烙法，与中医通用的灸法有所不同。然烙法并非阿拉伯医学特有的疗法，我国古代早已有之。老友康殷先生释金文「熨」字，认为「本象古代火烙疗法」，象把两块圆形物置于火上加热，以熨人背之状。唐代有专以烙法治疗黄疸的著作，名《点烙三十六黄经》。《备急千金要方》记载治疗瘰疽，有以「烧铁烙之」之法。有些中医外科与喉科古籍，也往往记载以烙法医治疮疡咽肿。这些资料表明，

早在《回回药方》成书以前，烙法即已在中医治疗中占有一席之地。另外，维吾尔族医学中也有烙法。所以《回回药方》中的烙法来自何方，尚难以断定。总而言之，认定《回回药方》是东西医学融合的产物，是符合实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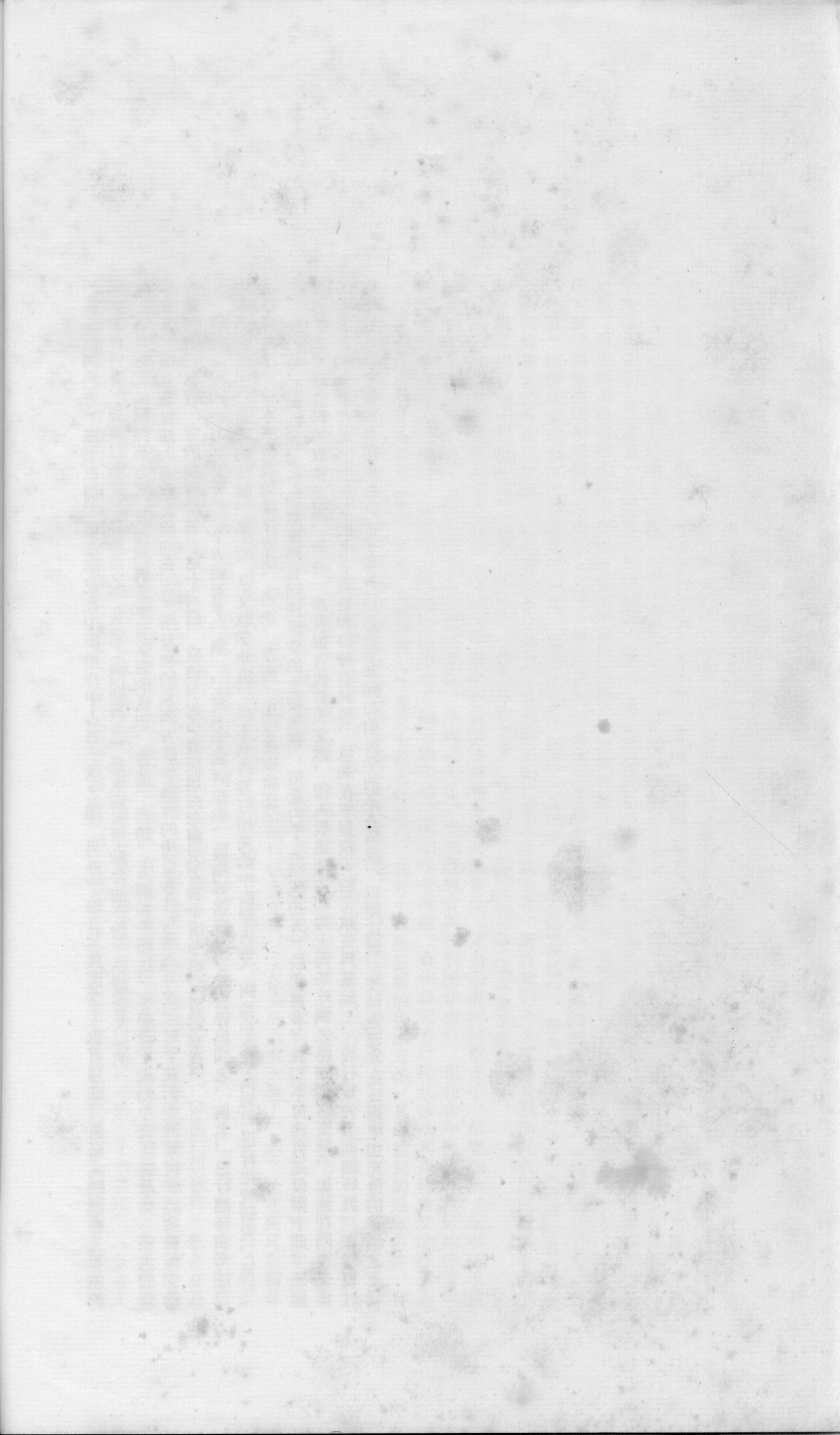
认真研究《回回药方》，发掘回回医学对疾病的认识、诊法、药物、方剂和外治法，不但对于我们今天防病治病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而且通过深入考察《回回药方》所反映的东西方医学融合的历史条件与融合方式，对于我们今天处理中西两种医学的关系问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少数民族医学研究者和中医学研究者的重视。

研究《回回药方》，应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对书中的阿拉伯、波斯等语言文字和音译的病名、药名，进行翻译和考证，为本书提供明白易晓的注解；第二，从文献学角度，以本书内容与相关的中医内容、阿拉伯医学内容，进行比较研究；第三，从临床角度，对本书所载的诊疗方法、药物、方剂，加以观察验证。

在当前，《回回药方》当然是研究回回医学的主要依据。但是由于《回回药方》缺失甚多，我们不可将目光仅限于此，还应努力扩大文献资料的收集范围，如进一步发掘古代有关文献，深入收集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考古资料，加强在回族聚居区的调查，访求有关回回医学的文字资料和口碑资料等，以期在掌握较多的文献资料基础上，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还应掌握维吾尔族医学、中亚各民族医学和阿拉伯医学的基本情况，以便比较，使结论建立在证据更加充分的基础之上。

一九九九年完稿

为出版回回药方而作



西域科学文化东传与《回回药方》初探

艾·努·安迪光

引

子

回回医学是中华传统医药不可分割的一支，是人类历史上东西方异质医药文化高度融合的产物。其独特的卫生保健医疗经验和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千百年由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而散居全国各地的回回民间集体传承下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次出版社影印这部尘封数百年的回回医学典籍，邀我写一篇研究报告或综述放在卷首。因《回回药方》现存残卷，只是原帙的十分之一、二，我又患目疾，正在治疗中，只好答应以首届「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一九八九年）、首届「国际传统医药大会」（一九九一年）、首届「国际中国医史学术会议」（一九九二年）、首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一九九三年）等重要学术活动中的发言、讨论记录，结合长期以来诸多「答问」、「解疑」等整理成此篇，勉为前言。

在过去的历史条件下回回医学未能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特别是它那东西合璧的「范型」理论体系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空白状态，严重地制约了回回医学应有的发展。这种研究的空白状态同时也使人感到它不知所以，或被否定其客观存在；甚至连本民族的研究者都认为，「由于历史种种原因」，回回医药已经「衰落于明清」，「合流于百川」，后来它在我国的「医学文献中已不复再现，可谓销声匿迹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在西安举行的「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开辟了回回医学研究的新天地。这次会议回顾总结了三十多年来自主研发研讨回回医学的成果；尤其是集中研讨了尘封数百年的《回回药方》，推动了《回回药方》的研究。

一九九一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共同举办首届「国际传统医药大会」，中国回回医学首次走上世界医药论坛。我曾阐述了回回传统医学的创兴和理论体系；重申了《回回药方》、《海药本草》、《饮膳正要》、《瑞竹堂经验方》是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四大医学名著的观点，引起海内外热心于传统医学人士的关注。

一九九二年首届「国际中国医史学术会议」上，我正式提出中国回回医学是回回人及其先民将同步移植东土的阿拉伯医药文化与中华传统医药文化不断整合与创新的结晶——也即「东西合璧」的产物，同时引起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认为这一「新论」，「有人类学和文化学价值，对现代中西医结合之路具有重要意义」。而《回回药方》正是我考证并提出的回回「四大医著」中从内容到文字表述都十分典型的「东西合璧」典籍，应该作为重中之重进行研究。

本文为论证以「东西合璧」为根本特征的回回医学范型，首先要阐明如何体现这一范型的理论，同时也要探讨与国内兄弟民族

医药知识相互交叉、渗透的以汉文或基本上用汉文表述的四大医著。这是因为回回医学早期的、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表述的医药文献已全部亡佚难考；如今存世的、以《回回药方》为首的汉文四大医著有的只剩下原帙的十之一、二，有的「佚」而犹「存」，有待继续发掘、整理，因此结合简介四大医著迄今的研究信息与成果，就显得十分必要。

「新论」的评价背后，其争论则罕有人全悉。有的学者依据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若干说法，尤其是以「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文化和科学的接触」的立论为依据，提出了与「《回回药方》是东西合璧产物」的新论完全相反的三个论点：第一，「阿拉伯文明的科学和科学思想，从最突出的意义上来看，是和欧洲的科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这是他论述「伊斯兰科学主要性质」的第一个结论；第二，当讨论「文化反过来朝另一个方向传播的事实」时，只找到十世纪阿拉伯医学家拉齐，在巴格达接待并帮助中国学者将盖伦的十六卷医著「速记」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却没有留下这位中国学者的姓名，也不知用的什么书法，因此无法进一步考证；第三，「关于希腊医药对中国医药的影响，简直一点痕迹也找不到。」李约瑟认为阿拉伯科学既然与欧洲形成一个整体，自然也包括阿拉伯医学在内，由此就可推理出阿拉伯医学对中国医学没有影响。也有的学者引述英国著名汉学家莱斯利博士「穆斯林汉文医药主要是明代的《回回药方》三十六卷」，看来与我们提出的「以《回回药方》为首的《回回四大医著》观点相似。但认真推敲起来，因为莱斯利提出研究此书应参考李约瑟的观点，实质上也是对「回回医学是东西合璧产物」这一「新论」的否定。不可否认李约瑟博士在这部巨著中以严谨、公正的学术态度，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宏伟画卷，为西方学术界打开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促进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相互了解，但他的某些观点确有重新研究的必要。为此，我在「五答李约瑟博士」的讲话中提出了新的看法，成为首届国际中国医史学术会议的话题，连同「新论」不胫而走，我的观点也颇得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赞同，所以本文也要从这谈起。

众所周知，世界上延续时期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的文化只有四个，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是其中之一。应当承认，它的性质和基本情况至今知之不多，加上它的历史发展盘根错节，其怎样传入东土，就更容易使人如坠云雾。其实，只要掌握了它的三大源流，三个时期和两个核心，就不难知其梗概。值得注意的是，以医学为核心的阿拉伯科学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大奇迹：一是在穆罕默德逝世不到一百年，就由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建立起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囊括了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古代文明发源地的阿拉伯帝国。令人惊奇的是其文化不仅未被同化，反而在吸收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当时领先世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二是在公元九世纪至十一世纪阿拉伯帝国分崩离析、各地割据王朝纷纷崛起时，反倒出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鼎盛时代；更大的奇迹则是公元十三世纪黑衣大食王朝被蒙古大军灭亡，有人误以为以医学为核心的阿拉伯科学文化也从此衰亡，殊不知我国的回回医学正是在蒙元时期发展到了黄金时代。

中国回回对祖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天文、历算和医药，因而本文要谈以医学为核心的西域阿拉伯科学文化东传，结合《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籍》的研究，证实古希腊与阿拉伯科学文化书籍及仪器已于十三世纪的元代传入中国。其中欧几里德几何学传入中国的时间也比通常的「明末说」提早了三百年左右，这些都对推动中国科学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要论「东西合璧」的回回医学独

特「范型」整合创新的全程，还要将《回回药方》与「四大医著」的内在联系进行说明探讨。本文试图抛砖引玉，从大文化的视角着笔，不仅要不同医学体系之间以及生命科学、相关科学之间交叉研究，还要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特别是从人类大文化着眼，从历史发展与客观现实相关联的视角，来重新审视、重新理解中国回回医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人类学和文化学的价值，为医学模式的转变提供借鉴作用。

一、西域科学文化的传入

(一) 最早的记载

拉齐和中国学者的交往

回回药方在历史上也曾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英国著名汉学家莱里斯博士在他的《伊斯兰汉籍考》中写道：「穆斯林汉文医药著作主要是明代的《回回药方》三十六卷，该书共四（大）卷抄本传世，藏于北京图书馆。参考……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九五四年第二版，第二一四页，「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文化和科学的接触」」。

他为什么要提出参考李约瑟的著作，可能因为在各种科技和医学史中，唯有这部书论述了西方医籍最早由中国学者如何译译之事，有利于《回回药方》的研究之故。现将李约瑟原书第一卷第二一四页、二一九页所说照录：

伊斯兰教这个对东西方关系具有深远影响的巨大新兴力量，恰好是在玄奘出发印度之前兴起的——公元六二二年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逃亡到麦地那，伊斯兰的纪元就从这一年开始。六五二年阿拉伯人完全征服伊朗后，他们的统治范围很快地到达中国势力的前沿；因此，毫不奇怪，中国和阿拉伯的接触能很早就在海陆两方面建立了起来……

文化反过来朝另一个方向传播的事实，可以从阿布尔—法拉吉·伊本·阿布·雅各布·纳迪姆（又名瓦拉克·巴格达迪，巴格达的文具商，公元九九五年卒）的《科学书目》中的一段重要记载得到证明。在这部公元九八八年完成的书目中，记载着有关伟大的医师和炼丹术士穆罕默德·伊本·查卡利压·拉齐（公元八五〇—九二五年）的一个故事。

拉齐说过：「有一个中国学者曾来我家访问。他在本城（大概是巴格达）住了一年左右。他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学会了阿拉伯文，并且确实讲的流利，写得通顺。当他决定回国后，他大约提前一个月对我说：「我要离开这里了，假使有人愿意在我离去以前，把盖伦的十六卷著作读给我听，让我笔录，我将非常快乐。」我告诉他说，这点时间还不够抄录一小部分。可是他说：「我求你在我走之前，把你的全部时间都送给我，并且尽快地读给我听。你会看到，你能读多快，我将写的比你还快。」这样，我和我的一个学生，便尽量快地向他读盖伦的著作，而他却写得更快。我们起先不相信他会正确地

抄录下来，后来我们校对了一下，发现他写的完全正确。我问他怎么能这样快，他说：「在我国有一种书法称为速写，这便是在你们所看见的。当我们需要很快抄录时，使用这种字体，然后再把它改成普通的文字。」可是他又说，一个能学得很快的人，也需要有二十年的时间才能掌握这种书法。」

李约瑟接着写道：

从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接触的这一短短的动人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国这位学者（很可惜他的姓名没有传下来）所用的便是「草书」。纳迪姆认为这整个故事所讲的是关于中国人的书法，这个故事有力地说明（即使不是绝对可靠）十世纪时盖伦的著作至少有一种中译本。不过我们以后会看到（本书第四十四章），关于希腊医药对中国医药的影响，简直一点痕迹也找不到。直到现在，中国的医学还是恪守它的独特的概念——阴阳、五行、郁、气、脉学（其中一部分可能由伊本·西那传入西方）、砭针、灸，使用矿物药也比西方要早得多，等等。

其实，李约瑟引录巴格达书商所著《科学书目》中的故事，还有一个尾声现在补录之，则便于讨论。

中国人有一种混合而成的墨水，好似中国的油。我见到的（这种墨）呈板状，上面有皇帝头像，即使一直写，一块也可以使用很长时间。（法）费琅：《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

难解之谜与回回医学

我们认为李约瑟博士书中引证的这段史料，不仅提示了盖伦医著何时与怎样出现了中国译本；还提示了代表西欧古典文化的希腊、罗马人的著作，中世纪时通过阿拉伯文这条渠道，又反过来传回欧洲，点燃文艺复兴之火（这是秉公学者公认的事实）。其中何时与怎样传到了东土，则是李约瑟博士首次提出了如此重要的线索，因而引起了海内外研究者，包括西方与日本汉学家们的关注。

特别是在他新修订的七卷三十四册巨著编写计划中，自己提出并要回答如此重大的问题：「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到三至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正如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所说：「这些问题是本书想要讨论的问题的一部分」，这虽然不是我们主要谈论的范围。但「拥有古代西方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他们所继承和发展了的希腊医学，究竟何时与怎样输入中国，海内外史书都没有记载。李约瑟引述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尤其在谈论《回回药方》是否译入时有所涉及，希望对这个问题能深入讨论。

可惜《科学书目》的原作者——以自己出生地命名为「巴格达迪」的著名书商，当时仅仅注意到这位中国学者的书法和笔墨纸张，连其姓名谁等最基本的情况均未记载。当时速记用的什么文字，更令人难以琢磨。但另一方面，李约瑟又肯定「关于希腊医药对中国医药的影响，简直一点痕迹也找不到」（实质上囊括了他所限定的「和欧洲的医学形成一个整体的」所有的「阿拉伯文明和科学思想」及其医药著述在内），因而留下置疑。为此，以下拟从五个方面与李约瑟博士共商，看看否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二) 一答李约瑟兼谈阿拉伯医著的译入

谁是最早逐译者 拉齐说：这个中国学者在巴格达，只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就能很好地说写阿拉伯文；用一种比读还要写得快的字体，一个月完全正确地笔录他们读的盖伦十六卷巨著。人们不仅要问，当时中国文字约有二十来种，这位学者笔录神速，究竟用的什么文字和书法？李约瑟说是汉字连笔草书。土耳其学者则谓，没有一点像汉字。在学术讨论会上，有位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不能完全排除这是一位我国少数民族穆斯林学者，如伊麻地丁那样。

不排除是我国少数民族学者

我支持这位学者的见解。迄今所知，我国首次用回鹘文编写的回鹘医学——古维吾尔医学的第一部重要文献《金钥匙》（《阿勒佟亚茹克》）于公元十世纪问世。其作者正是这位高昌回鹘著名外科医家伊麻地丁·喀什噶里。此书一九二〇年在新疆高昌古城出土，被德国考古学家冯勒·高克发现并带往柏林。据记载，他还将拉齐、法拉比和伊本·西拿的若干医著译入，可惜均已失传。但另有一本自己的专著，即《中国的土茯苓》一书，曾传到中亚和欧洲，十三世纪印度出版的《卡拉巴登卡比尔》（《大药典》）对它有较详细的收录。据悉：今新疆自治区的喀什维吾尔医院等，仍保存着这部大型工具书。

再说，这个得到拉齐支持逐译盖伦医著的中国学者，在当时阿拉伯帝国的新都巴格达受到如此款待，特别是他能在如此复杂的语言环境中进行交际和学术交流，诚非易事。因现在伊拉克一带，原来使用以帕拉维地区方言为主的中古波斯语言。当阿拉伯帝国迁都巴格达以前，哈里发阿布杜·马立克即规定阿拉伯语为官方正式语言。这个地区原有语言逐步被阿拉伯语取代。这位“中国学者”仅在此“住了一年左右”，“只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就高速完成中外医学跨文化传播的开拓性重任。看来非伊麻地丁这样，在自己母语中就有较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语汇，或学过这方面的“经文”者，是很难办到的。再者，还可能是常常接触这些“经文”的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或居住在我国西部地区的突厥语族的穆斯林学者在巴格达住上一年半载，经过口语和听视强化锻炼，也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因为阿拉伯帝国在八至九世纪进行过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两百年的“翻译运动”。希腊、罗马古典医学名著均已翻译成阿拉伯文被保存下来，并反过来流传到欧洲。拉齐当时口述的盖伦医书，必然是阿拉伯文译本无疑。所以这位学者不排除是我国少数民族穆斯林。

(三) 二答李约瑟兼谈《小儿锦》与《亦思替非》文

速记首推《小儿锦》

既然这位学者可能是中国少数民族穆斯林，那末他用的又是什么速写文字？我们认为可能是古代回回最早创造的、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一种汉语拼音文字《小儿锦》的变体。因为按照真实故事中所讲，拉齐师生二人轮番快速读盖伦医著译本，他们读得快，都能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他所用的中国文字，看来不可能是汉字《草书》，也不可能是我国西部突厥语的各

种文字的手写体。一则，用这些文字书写，不一定能读多快写多快；另一方面，当时在场的拉齐，还有后来的土耳其学者，对阿拉伯字母体系的多种突厥文一看便知，五十年以后的巴格达书商也会知道中国的汉字草书是什么样的。不会对当时用的什么文字如此长期存疑。我看有一个可能，它是「小儿锦」的变体或缩写。那末什么是「小儿锦」？什么是它的变体？我们这里要用一定的篇幅来「兼谈」此事。因为它不仅跟这位中国学者的速记有关，而且它跟《回回药方》的表述文字，以及回回书面语言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我们探讨《回回药方》必须对它有所了解。

最早的汉语拼音 什么是「小儿锦」？我国学者通常认为：它是中国伊斯兰的教师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一种文字，基本上是汉语拼音，并包含着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语汇，有时也夹杂地写上一两个汉字（参见白寿彝编《回民起义》第三册，其中「纪事」用的「小儿锦」文字影印插图和编者说明）。这应该说是，对回回首创的汉语拼音文字的权威性的解释。

有的研究者，从「小儿锦」的其它几个名称，如「小经」、「消经」、「小儿经」了来推敲，认为它跟明末清初之际，内地回回穆斯林等兴办「经文」大中小学，亦即经堂教育密切相关。比如：有人根据回回习惯上把阿拉伯文和「法尔希文」（改用阿拉伯字母后的中古波斯文，即「新波斯文」，回回穆斯林惯用此名），均称「经文」；于是将纯阿拉伯文、法尔希文的典籍，称为「大经」。相对而言，就把这种以阿拉伯字母为主，夹杂法尔希字母的汉语拼音文字及其各种译著，一律名之为「小经」。又说：过去的办学阿訇（主办经堂教育的学者、教师）和满拉（经生、学员），多不识汉字。办学阿訇要用小儿锦来编写辅导教材，而满拉记笔记、注解「经字」和「大经」，也要用它帮助吸收消化，故又称「消经」。或云：过去小儿上经文小学，首先要教他们学用小儿锦，所以就把这种启蒙文字和初级教材，都叫「小儿经」。近年来的研究者认为：「小儿锦」实为「小儿经」的雅称，或「小经」、「消经」的变音。但总得来说，都认为它是十六世纪后经堂教育的产物，并与「经堂语」不可分割。

沿波讨源、寻根究底 综观小儿锦诸说，各有所本，落实到「经堂教育」，更值得重视。尤其对我们如何从表述形态到内涵实质，全面、整体和历史地探讨回回医学和《回回药方》启迪良多。事实上，从整个回回医学而言，「佚」而残存的典籍，我们曾考证提出「四大医著」。但其中以方块汉字表述为主，以阿拉伯字母的汉语拼音文字为辅，既夹杂着一些阿拉伯原文语汇，更夹杂着许多新波斯文（以下简称波斯文）的药名、方剂名、古医药书名和「古回回医人」之名以及波斯文译音的文献，唯有这部《回回药方》。可见在小儿锦应用方面，它与经堂教育虽然有一定的共性或内在联系，但两者毕竟具体情况与研究视角不同。如果我们亦步亦趋地泥于「经堂」二字，上限不过十六世纪，实际上就会与源远流长的回回医学史及其典籍研究无补。

小儿锦的来龙去脉因文献无载，为寻根究底，应从民族文化和医药的交叉着眼，结合考古出土资料和其它方面的新发现进行探索。如近年来在西北地区和云南、福建等地陆续发现不少宋、元、明三朝的伊斯兰教碑文和穆斯林墓铭等。这些碑铭等有的以阿拉伯文为主，夹杂波斯文、突厥文、小儿锦、汉字和独特的阿拉伯文艺术字「方书」（见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真迹，其中「方体」似受汉文篆

字及古阿拉伯文艺术体影响)。在西安古老清真寺碑文中，也见有小儿锦夹杂其间。这些碑铭均可作为这种汉语拼音文字创始与应用更早的历史见证，因此它非始于十六世纪的经堂教育。

似可这样推论：唐宋时期回回先民，曾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字母拼写学习汉语和记事。小儿锦已略具雏形。十三、四世纪，回回逐步完成通用汉语的过程中，小儿锦不仅起到辅助和推动的作用，而且先后出现在大型译著中。《回方》就是在医学领域保留至今，唯一的基本上使用方块汉字并夹杂少量小儿锦和其它通用文字的专著。此外已知还有若干较早专用小儿锦编写的著述存世，如清初佚名氏的《塔志尼》，即全部用小儿锦撰写的。更重要的还有一部用小儿锦译注的伊斯兰哲学兼论生命的论著，这就是十八世纪法国东方学家布洛歇在甘肃发现并带走的那部用小儿锦译注的伊朗德黑兰哲学家阿卜杜拉·艾布·伯克尔的《米尔萨德》。据传，这正是在我国影响深远，用小儿锦译注的波斯文大型名著的手抄孤本（因迄今未见复制本和更加准确的报到，只能说『据传』），这部书的波斯文原著国内犹存。

其实，我国回回用『小儿锦』语气的白话文直译《米尔萨德》，并首次以《归真要道》为书名刊刻问世已经到了十九世纪末的光绪十七年。它与我国最早用小儿锦译注《米尔萨德》波斯文原著并非一回事。所见海外对《米尔萨德》的一些报道，可能由于这些学者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还有后来用『经堂语气』的白话文译著的出现，以及更早用小儿锦译解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大经』等情况不熟悉，或误将小儿锦当成了阿拉伯文或波斯文所致。对国外这些各有所专的学者所出现的白璧微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回回药方》与小儿锦

由于《回回药方》四种文字同时并存，除以方块汉字为主，更以小儿锦为辅；且夹杂着阿拉伯文和较多波斯文语汇。后三种是共同使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仅从所使用的字母来看大同小异：波斯文只是另创造了四个新字母；小儿锦除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外，还兼采用波斯字母；还另有若干创新。不了解这些情况，或不认真鉴别，则容易混淆。或误认为《回方》只有方块汉字和阿拉伯原文；甚至据此论断《回方》为阿拉伯医学名著之译本等等，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回顾本人十年窗下编研《中国回回医学史稿》时，曾以《回方》进行重点探索。所据家传五卷半抄本，与北京图书馆四卷抄本有所不同。经比较研读，两种残卷除目录卷之下、卷之十二、卷之三十、卷之三十四基本相同外，前者另外多出『目录卷之上』（也即《回方》全部目录保存完整），还有多半卷散篇，以原卷之三十六中『众花果草治病部分』居多。尤为突出者，其中小儿锦注释较多。虽然是汉语拼音文字，由于古今语音变化较大，破译相当困难。记得手头仅有的两本小儿锦工具书（如《照赫勒》与《中阿双解谐韵字典》）已无能为力。同时发现《回方》中波斯文药名、方剂名、地名、书名和『古回回医人』之名，比阿拉伯原文更多，而有些则有小儿锦边注。经多方求教、咨询，特别是在老阿訇、老学者耐心指导下，终于将《回方》中上百个小儿锦、波斯文和阿拉伯文难解的方药、名称和词汇基本破译，并制成以小儿锦拚注汉文为主几种回回早期通用文字对照表。连同《回方》中有较多小儿锦旁注的『目录卷之上』和『目录卷之下』一并载入拙作《中国回回医学史稿》（本书重修增订本即将再次问世，可供参阅）。

总之，由于小儿锦是拉齐当时难以辨识的特殊变体的速写法；因而能够将他尽快口授的以阿拉伯文逐译的西方古典医学名著，高

速准确地译入东土。

唯其「变体」一发双贯

说到这里言归正传，实际上业已回答了李约瑟关于那位中国学者用什么文字速写拉齐口述盖伦医书的事，那就是我们首推的回回小儿锦的「变体」。纵观我国古代已知各种文字，可以被那位中国学者「称为速写」的「书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汉字草书中摆脱了汉初「章草」隶书笔画的「今草」，而能够写的更快的则应推唐代兴起的「狂草」；再一种就是回回首创的小儿锦「变体」，它既能快捷记录方块汉字，又能高速书写阿拉伯字母体系的一切文字。这两者究竟哪种更有可能？我认为小儿锦变是其中之一。

正如李约瑟所谈：「在七—十一世纪中，希腊科技典籍中全部著作和大部分次要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可见拉齐当时口授给中国学者的盖伦医著十六卷是阿拉伯译本无疑。拉齐师生二人虽然「尽量快地」诵读，而这位中国学者「却写得更快」，而且经其「校对」，认为已经全部「正确地抄录下来」。倘若当时中国学者用的是汉文「狂草」，则快捷可有余，但必须一边听拉齐用阿拉伯文快读，一边还要想如何译成汉字记录下来，未必能保证拉齐「能读多快」，而「将写的」比他「更快」。因此我们首先推断，可能是一发而双贯的这种特殊文字的加「变体」，有可能如此高速而准确地将全部阿拉伯文语汇的盖伦医著记录下来。

留下新疑团

中国学者对拉齐说：「在我国有一种书法称为速写，……一个能学得很快的聪明人，没有二十年的时间也不能掌握这种写法。」这样一来，我国回回首创的小儿锦及其「变体」，似乎是不难解开的疑团。另外我国古代还有一种从「西域」传入，可以写得更快的缩写速记文字，即争论了几百年的「亦思替非」文。

几百年的争论由此而起

什么是「亦思替非」文字，它最早见于元代的官方文书，这场争论正是由它而引起的。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公元一二八九年），尚书省曾任回回译史的麦术丁，鉴于元政府中会「亦思替非」文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而「亦思替非」字，宜施于用。于是推荐「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元世祖可其奏，「始置回回国子学」。到了元仁宗延祐元年「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并规定「学之建制在于国都。凡百司庶府设译史，皆从本学取以充焉」。

由于对这历史上仅有的「亦思替非」史料的理解与所本不同，认为「亦思替非」是粟特文者有之；认为是阿拉伯文者有之；认为是波斯文者有之，几百年来众说纷纭。

什么是「亦思替非」文 伊朗德黑兰大学穆扎法尔·巴赫蒂亚先生的研究，解开了百年之疑。他说：「亦思替非」本意乃是「获取应用之权力」或「向某人取得应得之物」。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其意为：「财产税收的核算与管理」。因此在古代大多数伊斯兰政权统治的国家，类似现代财政部的部门称为「亦思替非部」。

除去政府的财务活动，财务的核算与管理对古代封建主及商人也是异常重要的，精通「亦思替非文」的人员称为「莫斯替法」，「莫斯替法」是一种重要而令人羡慕的职业。在古代教育中，「亦思替非」的教育占重要地位，在学科分类书籍中「亦思替非」始终是一项必要而有益的专门科目，强调「亦思替非」不同于一般文秘工作，要掌握它必须受专门的训练。「亦思替非」乃是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用于国家文书之中，它有特定的写法与规则，国王及政府有关税收的诏书、清算单据、税务文书等都用这种文字书写，而以一种称为「思亚格」的方法计算。对于擅长此道的人运用及识别这种文字并不费力。这种文字类似缩写符号或象形文字，只表意而不标音。（转引自穆扎法尔·巴赫蒂亚著《亦思替非考》，参见插图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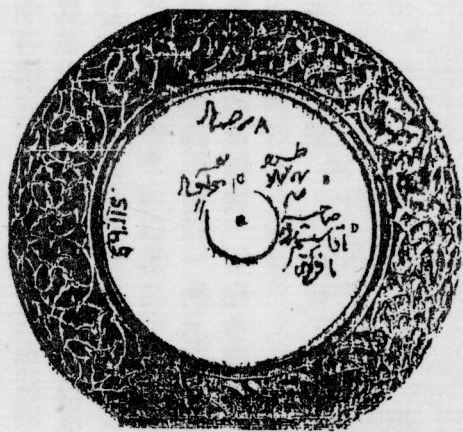


图1 十五世纪末伊朗制的雕纹银碗碗底背面之“亦思替非”文字

图中为一只收藏于华盛顿市菲里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的银碗，其编号为54—115。图中分别以A B C字母标出之文字即“亦思替非”文。文字表明此碗之重量，用银数量，纯金属与合金的比例等。这一切均以伊朗古代银器制造业术语表示，并雕刻于碗底背面，以字母D标出的文字是普通波斯文，表示此碗订制者的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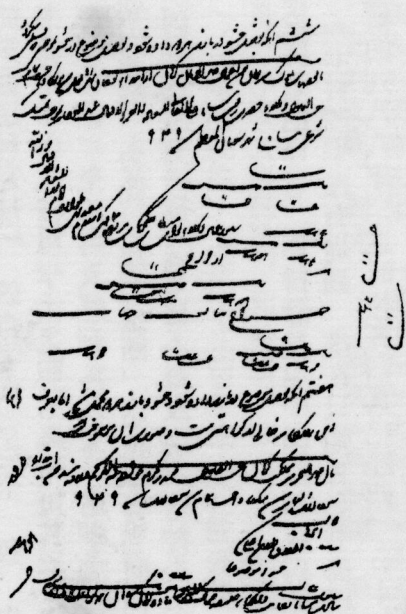


图2 亦思替非文与波斯文对照（公元1542年的一个文件）